

以诗明史: 美国环境史学的文学性探析^{〔*〕}

○ 王玉明

(安徽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6)

〔摘要〕无论在源头还是在其发展进程中, 美国环境史学均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 其审美特质和批判精神, 是“史”与“诗”互动的结果, 是其活力之所在, 更是环境史学者人文精神和普世情怀的体现。借助优雅的语言、文学式隐喻、多元的叙事及文化批判精神, 美国环境史学已超越“旧史”的传统, 进入当代史学的主流, 在国际史学界亦已形成研究气候。在此背景下, 对美国环境史学的文学性进行考证与论述, 将使其意义得以拓展, 并为中美当代环境史学研究的文学阐释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美国环境史学; 边疆; 荒野; 审美; 文学性

“环境史”一词最早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由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罗德里克·纳什(Roderick Nash)提出。当时, 面对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 史学家的人文关怀日渐自觉, 进而开拓了人与环境间关系的研究视野, 环境史学应运而生。如纳什所言, 环境史学是“对环境负责的呼声的回应”, 研究“历史上人类和他的全部栖息地的关系”。^{〔1〕}因此, 对环境史进行多元化研究, 于历史和现实均具有深远的意义。迄今为止, 美国环境史学已经历了资源保护史、西部边疆史、环境思想史、环境变迁史, 以及环境社会史等几个阶段, 相关研究也已就历史和生态环境、人文地理、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关系展开探讨, 然而就环境史的文学性问题, 现

作者简介: 王玉明(1970—), 安徽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英语系主任、硕士, 研究方向: 美国生态文学、美国文学生态批评、美国文学教学等。

〔*〕本文系安徽省 2012 年度高校省级重点人文社科项目: “生态视角下美国文学中的身份悖论”(课题编号: SK2012A049); 安徽农业大学 2013 年度学科学位点建设项目(课题编号: XKXWD2013028)的阶段性成果。

有成果则少有涉猎。但实际的情况却是,美国环境史学与文学关系密切,其中的隐喻多与文学相通,使用的语言和叙事手法也颇具文学审美特质。本文就美国环境史学诗意的语言、审美的境界、文学式隐喻及批判精神等文学性表征,逐一考证,稍加论述,以期“史”与“诗”的互动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并为基于史学与文学间关联研究的当代环境史建构提供有力的切入点。

一、诗意之所:历史文本中的审美境界

“史”与“诗”是一种辩证关系,两者的相互制约与相互渗透,可以使作品在“历史”范畴内呈现审美的“诗意”性。^[2]无论就其渊源,还是不同阶段的代表成果,美国环境史学均集优雅的语言和艺术化的叙事传统为一体,富含文学的意蕴、诗意的品质,使人从中能经历“气息”、“氛围”、“情调”、“韵律”和“色泽”等情感体验,感悟文学的品质,并由此进入审美的境界。^[3]

(一) 优雅的语言传统

美国环境史学与文学的关系源远流长,从其诞生起就具备了诗性的特质和审美的意蕴。1789年,近代西方环境史之父,英国的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率先以书信体的文学样式,记录了其家乡塞耳彭村在工业革命前的环境状况及其变迁,完成了《塞耳彭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正是由于其文学性,该书至今仍被人们追捧并广泛阅读。怀特熟练地吸收和运用古典文学以及近代思想的智慧来完善他的作品。从维吉尔的《牧歌》中,怀特聆听到来自树林间回荡着的蚱蜢的尖叫声。即使是对于蜜蜂的自然性的刻画,也渗透着古典诗文的气息:“还有声音击打穹石,发出鼓荡的回声。”^[4]在描述动物的蜕皮时,怀特还借用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的语句,^[5]将生态史记录与文学旨趣精妙地结合起来。难怪有学者以“别调”一词来描述该部佳作,说它“宛如图画,生动、逼真地描绘了生活的某一时期,是自然、亲切、愉快的书札”。^[6]怀特用一种寂寞的、恬静的、优美的文笔表达了对生态环境变迁的忧思,对后来美国的环境史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是美国“生态伦理之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949年,利奥波德出版了《沙乡年鉴》(*Sand County Almanac*),其散文化的语言,简洁、优雅、飘然,是科学与文学、哲学的融合,意境幽远。^[7]以其优雅诗意的书写和对自然界的敏锐观察,该部著作成为20世纪美国环境伦理史上的里程碑,美国环境思想史学的经典文本。

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1962)则是继怀特《塞耳彭自然史》之后西方生态思想史上的又一部力作。在其开篇里,卡逊以诗一般的文字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恬静的世界,如童话般美好,人类本该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的。可是有一天,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在这儿的天空,鸟儿不再歌唱,河流不再清澈,花儿不再微笑,人们也相继病倒,这一切又确实并非虚构,世界上多少个城镇正面临着这样的蜕变。^[8]地球上的春天原本鸟语花香,卡

逊以诗意的描写,使身处无声之春的人类开始重审并反思自己的生存方式。

作为当代经典环境史文本,自然书写的范例,贝瑞·罗培兹(Barry Lopez)的《北极之梦》(*Arctic Dreams*, 1986)更是一部史诗结合的佳作。在该书中,贝瑞追述了自己和一群地质学家、古存在论者和博物学家在亚北极地区4年的研究生活,讲述了北极的生态和环境历史,赞美了那些在恶劣环境中顽强生存的动物和植物,为它们代言。^[9]以对鸟类迁徙的观察和描述为例,“呼吸,像土地的气息。春天吸纳大量的光线与动物的迁移。夏天缓和呼吸。秋天吐露催促他们往南的气息”。^[10]如此优美的句子,为作品增添了一份诗意,除了给读者以审美体验,还传递这样的信息,想象的力量可让异地乃至荒地升华为充满活力与生命力的处所。

(二)多元的叙事手法

“善叙事”是“良史之才”的基本条件之一。所谓“良史”,就是优秀的、出色的史家;“善叙事”则指“辨而不华,质而不俚”。从审美的角度,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也认为“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即优秀的史书在于叙事,^[11]在于著述历史的能力。某种程度上,这是文学的侵入,是文学性的体现。

基于生态文学的写作传统,美国环境史学代表著述呈现出多元的叙事模式,彰显艺术与审美特质。作为美国西部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倡导者,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Turner)在其作品中展现出的叙事能力让人敬佩。在威斯康星大学求学期间,特纳广泛阅读文学经典,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自己后来以“边疆”为主题的作品,尤其是其多元的叙事手法。而纳什在《荒野和美国精神》(*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1967)中使用的叙事手法则更为丰富。作品多处借助小说、诗歌、回忆录、私人日记,甚至神话,朴实但不失趣味的叙事风格,具体、形象地展示了荒野在不同时代和不同人眼中的画面,显现出美国荒野思想的演变历程。^[12]通过该作,纳什在努力告诉人们一个完整而准确的新大陆荒野变迁的故事,其高超的叙事手法更是凸显文学的维度。

在美国环境史学的经典之作《花园中的机器:美国的技术与田园理想》(*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 1954)中,利奥·马克思(Leo Marx)讲述了一个持久的美国田园理想,其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开创了基于文学文本分析的倒叙模式,对美国文化在矛盾冲突中演变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全景呈现。作者在引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后,设法对霍桑以降的几位重要文学家作品中展现的田园理想与机器文明冲突的主题进行了阐述,剖析美国文化蕴涵的种种悖论和不确定性。^[13]马克思在该部历史著述中开创的叙事手法,极富文学特质,为环境史学中的文学介入提供了新的视角。

1979年,美国年轻的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出版了《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Dust Bowl: The Southern Plains in the 1930s*),在这部当代美国环境史学的开山之作中,沃斯特以夹叙夹议的手法讲述美国南部大平原上的土地和人的故事。那些怪僻的地质名词、枯燥的统计数

字、甚至艰涩的经济学概念,通过沃斯特的笔,似乎都能在纸面上活起来,使人不觉得过于隔膜和难懂。史学文本能入如此佳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叙事能力。^[14]在沃斯特的指导下,其学生亚当·罗姆(Adam Rome)于2001年出版了《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蔓延和美国环境主义的兴起》(*The Bulldozer in the Countryside: Suburban Sprawl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罗姆仍然采用文学化的叙事手法,讲述的是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一个美国人习以为常,以致难以进入史学家视野的故事,但其中蕴含着美国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环境变化。^[15]

早期的自然书写和当代生态文学是美国环境史学的重要渊源,科学式的记录加强了环境史学的说服力,文学化的语言则给历史叙述插上了诗的翅膀。美国环境史学家们书写记录的是北美大陆生态环境的变迁,最终呈现给读者,引起世人关注的却是一片被人类活动破坏的处所,在其优雅语言和多元叙事传统的背后,掩饰不了的是史家们构建诗意栖所的动机与理想。或许,正因为此,美国环境史学的演进与发展才得以形成潮流,引人注目。

二、边疆与荒野:文学式的隐喻

在美国文学和环境史学中,作为文学式隐喻的边疆与荒野均具有双面性,它们既是对现实的观照,又是想象的产物,是美国民族无法磨灭的记忆。早期的美国环境史研究中不乏对边疆与荒野的关注,随着美国社会与环境的变迁,其想象的特质似乎越来越超过其现实维度,始终浸润着美国民族对于新大陆的玄想。文学文本中边疆与荒野的母题以隐喻的形式呈现在环境史著述之中,这已然成为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一大特色,更是其与文学的纽带。

(一)“边疆假说”:源于文学想象的西部幻景

边疆意象是美国殖民时期清教徒对新大陆自然与生态历史记录的核心成分。殖民者开拓的西部边疆后来渐渐变成了一种文学的想象、诗意的传统,在美国环境史学先驱特纳的著述中以“边疆假说”加以呈现、得以提升,并逐渐固化为美国民众乐观精神的动力。边疆概念是美国环境史和美国文学交融互证的结果,极具想象特质与隐喻性,在很大程度上给美国环境史研究增添了一层想象的色彩。但当这种基于广阔西部的想象暴露出一种民族自负与帝国扩张倾向的时候,民众和学界几乎同时作出反应,开始质疑特纳的边疆假说,重申并反思美国的西进拓疆传统。边疆概念形成于早期的自然书写与文学玄想,发展于环境史学,但最终对其责难与诟病仍来自文学。

美国文化中的边疆概念发轫于美国民众集体意识中的“西部情结”。新大陆的清教徒认为,自基督教根植于人类以来,事物发展的常规方向总是由东向西的。如果发现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离开此地,向西去,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西部意味着理想中的福地。^[16]西部观念成为美国人承载民族使命的一种精神寄托,沉淀在美国人深层心理结构之中,形成

“西部情结”。^[17]无论是詹姆斯·库柏(James Cooper)笔下的纳迪·邦波(Natty Bumppo),还是马克·吐温(Mark Twain)小说中奔逃在密西西比河上的哈克(Huck),均是这一“情结”在不同时期美国文学中的呈现。

基于西部情结的“边疆假说”在特纳的作品中得以成型并固化。作为美国环境史先驱,特纳于1893年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中提出了“边疆假说”,轰动了美国史学界,也由此开美国边疆史研究之先河。特纳认为,美国建国之初的“边疆”,实质上是欧洲的“边疆”,当时的美国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方面无不深深地打上了欧洲的烙印。特纳的“边疆假说”使美国史学开始走出欧洲的阴影,开始努力从本土寻找美国文明的根源。但令人不安的是,美国人的边疆生活却铸就了美国人狂妄自负的个性,特纳的“边疆假说”则在助长着一种“扩张有理”的思想。美国人相信,家乡以外的西部有着无尽的资源、自由与希望,脚下的土地一旦受损,向西行便成了一种集体理想。但当人们西行至加利福尼亚后,同样的环境问题和城市疾病使得移民们的理想一一被击破;面对难以跨越的浩瀚太平洋,在他们内心被激起的仍然多半是殖民扩张之本性。也正因此,特纳的“边疆假说”后来遭到越来越多的非难。批评之声不少来自文学界,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呈现。以《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1939)和《在路上》(*On the Road*, 1957)为例。背井离乡,一路西行的乔德(Joad)一家,在梦想中的加州并未找到福地,因为他们偏离了本真,丧失了人类诗意栖居的特质。同样,逃离令人窒息的东部后,萨尔(Sal)在旅途中并未见到期盼已久的西部风情,却看到了饱受工业文明侵蚀的西部大地,最终未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边疆”北美早期定居者对新大陆的文学想象,是特纳贡献给美国史学的重要术语,由之延展而成的“边疆假说”堪称有关美国历史发展模式的经典解释。然而,特纳就其用意的界定却远非严谨,他赋予“边疆”的意义是如此宽泛而散乱。^[18]早期文学中饱含拓荒精神的边疆意象逐渐演变成对扩张的隐喻,犹如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在此背景下,满怀生态情愫的文学家们则以西部噩梦的隐喻对边疆隐喻进行揭示与消解,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新西部史学的诞生。

(二) 荒野意象:从悖论的情结到民族理想

美国的历史与荒野关系密切,荒野是环境史学家和文学家心目中一个充满悖论的情结,它象征着优雅与田园,令人向往,同时又暗含野蛮和险恶,让人生畏。^[19]

美国人的荒野观在旧大陆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在欧洲,许多民间传说和故事把荒野与邪恶、黑暗、恐怖和不道德等令人不愉快的事物联系起来,认为荒野既是被诅咒的贫瘠土地,也是纯净心灵、接近上帝的自由之地。欧洲文化传统先入为主,影响和塑造了新大陆移民的荒野观。^[20]换言之,在欧洲移民到来之前,荒芜的美洲大陆早已成为某种文学意象,深蕴象征意义,其中潜隐自由和机遇,更包含生存的危险性。^[21]这种殖民地荒野意象的二元性在早期的历史著作

中有所揭示。如果说威廉·布雷德福(William Bradford)笔下描写的是新教徒对迷失或隔离在新大陆那“咆哮的荒野”之中的迷惘与恐惧,那么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则在人们眼前呈现出一个“富饶的天堂,一片纯洁的圣土;土地是如此肥沃,食用的植物和水果比比皆是”。^[22]

荒野的价值真正被发现并加以欣赏,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美国环境思想史的研究成果。美国的环境史学家对荒野情有独钟,他们着重探讨人们的自然观念,论述了美国人对荒野的态度转变,探究环境危机的文化根源,最终以文学隐喻的方式为荒野正名。2006年,纳什在接受《环境史》杂志采访时曾说,荒野是一种令人激动的新奇事物。在其导师的鼓励下,纳什更加注意“宏观图景”和阐释一种思想的“文化背景”,正是基于此理念,其代表作《荒野与美国精神》从文明与荒野关系的角度,系统、客观、全面地考察了美国人对荒野之态度和认识的历史变迁,探析了导致这些变化的文化渊源。^[23] 马克斯则在其著述中指出,荒野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还在于其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荒野在现实生活中最接近原始自然,对解答什么是自然、自然的演替是否有规律以及遵循何种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至关重要。纳什和马克斯都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荒野的价值,在其代表作《荒野与美国精神》和《花园中的机器》中,荒野的概念均富有文学隐喻性,蕴含着作者诗意的情怀,更加突出荒野的浪漫之维。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美国文化中荒野与文明的二元对立。

语言一旦被用来书写历史,隐喻总会伴其左右,并协助建构历史。作为环境与人类互动的第一媒介,隐喻有助于探索人类与他者的差异。在美国文学与环境史学中,边疆和荒野意象与美国精神密切相连。源于早期殖民时期历史记录和文学书写的边疆和荒野,以隐喻的形式贯穿于各阶段的环境史著述。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基于西部观念的边疆假说演变为极具帝国情结的扩张理论,最终遭到文学界和公众的质疑与诟病。而伴随环境思想史的展开和推进,荒野原本令人生畏的一面逐渐被浪漫主义和生态理想所消解,荒野已然成为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其审美特质和精神维度近乎为文明的解毒剂,其教育价值及生态价值也在不断促进美国民众环境观的转型。

三、尘暴之外:一种文化批判

批判性特质本属于现实主义文学,但欧美新史学观认为,历史不只是为了记录史实,也应该进入批评领域。美国环境史学正因其尖锐的批判性而独树一帜。^[24] 无论在沃斯特对美国20世纪早期“尘暴”灾难的控诉中,还是在后“9.11”时代美国环境史学的社会史转向上,此种批判精神均可见一斑。从理论上讲,环境史学也可具有文化批判精神,美国环境史的文化批判取向与“文学性”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就其整体而言,与生态文学关系密切的美国环境史学透出的批判性特质,尤其是环境史学家们对“尘暴”灾难及“9.11”事件所暴露出的文化问题的质疑与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兼具了文学的气质,超越了“旧史”的

传统,体现了环境史家们对文学的吸收与包容。

(一) 尘暴的背后:环境史学中的文化批判

美国环境史学有着鲜明的批判性特质,无论是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的《生态扩张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 1993)还是沃斯特的《尘暴》,描述的都是资本主义扩张所导致的生态灾难和社会悲剧。这些著作非常震撼人心,彰显道德与伦理诉求,充分发挥了环境史学深刻的教育与文化批判功能,在警示的背后充盈着对世人的殷切期望和对人类出路的漫漫求索。其中沃斯特对“尘暴”的描写与控诉实则史学家对文化的批判,抑或是一种文学式拷问精神。美国历史学家马林曾将西部沙尘暴归因于西部独特的气候,沃斯特对此持反对观点,并指出,那种个人主义的、以掠夺自然为基础增值个人财富的文化价值观念,才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25]

沃斯特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够对环境问题进行深入的文化批判。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尘暴暴露的是美国传统文化中的根本弱点,是美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沃斯特对尘暴的文化批判,具有普遍性,适用于一般的环境问题,因为环境问题的产生与支撑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体系的价值观念息息相关。沃斯特的文化批判可谓一语中的,发人深省,和那些将环境问题归咎于偶然的自然灾害或是科学技术的人士相比,该作品中的文化批判无疑要深刻得多。^[26]这种批判精神是沃斯特作为一名环境史学者的使命之所在,是其人文主义关怀的具体体现,也是该作对环境史学研究的新的启示。

(二) 反思与超越:后“9.11”时代环境史学的社会史转向

“9.11”事件是后现代语境下的另一场“尘暴”,它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乃至处世哲学,无论政界、经济、文化领域都对它做出了反应,只是方式各有不同,角度也有所差异。“9.11”事件后,美国环境史学更注重反思环境问题的思想文化根源,实现研究的社会史转向成为潮流。从理论上讲,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只会使环境史学逐渐脱离其“文学性”特征,但实际的情况却是,“9.11”之后,美国环境史研究更加关注族裔、女性等社会人群,而与之巧合的是,生态文学也从浪漫的自然书写中醒来,更加关注社会不公与社会正义,在此背景下,本就关系密切的美国环境史家和文学家们走得更近,环境史学愈加体现一种文学式的关注与人文情怀。

“9.11”事件中,袭击美国造成灾难的凶手是美国人眼中的“他者”,而环境史学给当代人类的启示恰恰在于鼓励民众从整体主义出发,反思并超越美国历来已久的“白人优先”和“消费至上”的民族文化,在为环境正义而斗争的同时,逐渐培育对族裔“他者”的观照和欣赏。“9.11”让美国人学会更多地关爱,更努力地投身与世界的种种社会非正义作斗争。但令人遗憾的是,“9.11”之后,美国的人均能源消耗仍然居高不下,美国政府仍旧固守帝国心态,美国的军备扩张计划仍在上演。在此语境下,环境史学更加有所作为,社会史转向已成为主流,其文学式的文化批判向度得以拓展、深化。历史学家并不太适合预测未来。不

过,这只是一种表象,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点是,受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环境史学被越来越频繁地与“主流”历史问题联系起来。例如,种族、阶级和性别是大部分历史分支学科研究的重心,现在也成了环境史学家越来越感兴趣的领域。大体上看,环境史学的核心是在全球规模上研究广泛的环境历史与社会问题。^[27]环境史学的社会史转型将使更多美国人意识到美国对世界资源的消耗与影响,在更多关注全球生态环境的命运的同时,对源于环境非正义的社会非正义的关注,将成为研究的重点。

作为美国环境政治史的后裔,生态文学的近亲,美国环境史学必然会坚持一种批判的姿态,彰显文学的特质。“9.11”之后,对于环境史学者和文学家而言,有两点不可回避,即他们首先生活在一个恐怖和危机四伏的时代,再就是他们不能让恐惧成为生活方式,而应努力在黑暗中拥抱希望。^[28]环境史学,说到底,就是更换了评估人类行为的参照系,以长期效应来看待人类的存在方式,这正是环境史叙述的革新之处,也是人与自然的疏离和异化之历史真相的反映。^[29]美国环境史学文学式的批判精神和对环境问题思想根源的追问,体现了它对人类文化和生态系统的高度责任,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环境史学的学术内涵,使其得以进入历史学的主流和生态整体主义的人文境界。

综上所述,美国环境史学家们对于历史的表现及思考是具有文学特质的。这与古希腊人的相关观点倒是不谋而合,合格的历史学家应富有激情、充满想象,且擅长优美的言辞和逼真的叙事,使人们阅读历史就像阅读文学一样,从中获得乐趣和教益。当下就美国环境史的文学性问题的讨论,其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建立平衡,而不是舍弃,即如何以史学的立场去包容文学。这也是前人所谓“文士不能修史、史家必须通文”的真义之所在。美国环境史学的出现及其文学性的介入,恰恰说明了史学总是在不断更新嬗变的,唯有此,史学才能保持其活力与魅力。以其诗意语言的审美意蕴、多元化的叙事手法、互为渊源的“边疆”与“荒野”双重隐喻,以及文化批判精神,美国环境史学超越了传统,凸显一种文学的气质。这正是美国环境史学的活力之源和魅力之所在,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反哺美国作家的文学创作,形成极富美国特色的“史”与“诗”互动的局面。也正因此,其意义得以拓展,对当代环境史学研究的文学阐释产生的启示也更为深刻。

注释:

[1] Nash, Roderick.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New Teaching Frontier*.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41, No. 3, p. 363.

[2] 李本红:《历史剧的“戏说”与历史“诗意”的构成——汤显祖和“雪中芭蕉”的启示》,《学术界》2013年第4期,第128页。

[3] 童庆炳:《谈谈文学性》,《语文建设》2009年第3期,第56-57页。

[4] [英] 吉尔伯特·怀特:《塞耳彭自然史》,缪哲译,花城出版社,2002年,第329页。

[5] 于文杰、毛杰:《论西方生态思想演进的历史形态》,《史学月刊》2010年第11期,第105页。

- [6][美]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侯文蕙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3-24页。
- [7]王小伦:《美国西部山脉形象的演变——以三位自然作家的三篇散文为例》,《外语教学》2008年第6期,第75页。
- [8][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3页。
- [9][德]克蕾思特·格瑞佛波文:《如何为无法言说者代言:自然之声的美学》,李晓菁译,《鄱阳湖学刊》2012年第3期,第121页。
- [10]Lopez, Barry, *Arctic Dreams*. California: Scribner, 1986, p. 162.
- [11]瞿林东:《历史撰述的叙事与议论》,《安徽史学》2004年第4期,第12-13页。
- [12]侯文蕙:《荒野和文明的两难抉择——纳什和他的〈荒野和美国精神〉》,《绿叶》2011年第9期,第128页。
- [13]宋丽丽:《理想与现实的两难调和:要田园理想还是要机器至上?》,《绿叶》2012年第1期,第100页。
- [14]侯文蕙:《〈尘暴〉及其对环境史研究的贡献》,《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第8-9页。
- [15]侯深:《〈乡村里的推土机〉与环境史研究的新视角》,《世界历史》2010年第5期,第134-40页。
- [16]王玉明、冯晓英:《西行还是诗意地回归——〈愤怒的葡萄〉生态维度之追问》,《外语研究》2009年第1期,第90页。
- [17]王守仁:《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3页。
- [18]何顺果:《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从特纳的“边疆假说”谈起》,《美国研究》1993年第1期,第104页。
- [19]高国荣:《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特点》,《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第107页。
- [20]Nash, Roderick. *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8-20.
- [21]杨金才:《论美国文学中的“荒野”意象》,《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2期,第58页。
- [22]转引自朱新福:《论早期美国文学中生态描写的目的和意义》,《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72-73页。
- [23]滕海键:《世界视野中的美国荒野史研究——从罗德里克·纳什及其〈荒野与美国精神〉说起》,《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145-146页。
- [24]王祖友:《美国文学的批判性、独创性和多元性》,《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1年第2期,第245页。
- [25]付成双:《从“美洲大沙漠”到“雨随犁至”——美国人大平原观念的变迁与西部开发》,《史学月刊》2012年第11期,第87页。
- [26]高国荣:《对环境问题的文化批判——读唐纳德·沃斯特的〈尘暴〉》,《世界历史》2003年第5期,第95页。
- [27]包茂宏:《马丁·麦乐西与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9卷第4辑,2004年12月,第126页。
- [28][美]斯科特·斯洛维克:《走出去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韦清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8页。
- [29]梅雪芹:《环境史:一种新的历史叙述》,《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3期,第40页。

[责任编辑:黎虹]